

2010

2015

21世纪年度散文选

散
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 编

短篇小说
中篇小说
散文
报告文学
中国文艺纪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

非
外
借

21世纪年度散文选

散
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7 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21 世纪年度散文选)

ISBN 978-7-02-013901-9

I. ①2… II. ①人…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2122 号

责任编辑 杜 丽
装帧设计 马诗音
责任印制 任 祎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86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插页 3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901-9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我社自1980年起,曾经编选和出版过《1980—1984年散文选》《1985—1987年散文选》《1988—1990年散文选》和《1991—1993年散文选》,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1994年后,这项工作一度中断。进入21世纪,散文创作仍然欣欣向荣、气象万千,成为文学园地一道亮丽的风景。为了及时总结年度散文创作的实绩,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散文作品,进而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我社决定恢复年度散文的编选和出版工作。

恢复出版的散文年选总冠名为“21世纪年度散文选”,每年编选一册。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散文作品,入选篇目以发表时间顺序排列。此项工作得到了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并且提出了很好的编选意见,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严格进行编选。在此,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

我们希望读者通过这个选本,不仅能了解本年度散文创作的总体概貌,而且能集中欣赏和阅读这一年里出现的最优秀的散文作品。我们的努力是否达到了这样的效果,真诚地期望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梦回祁连	雷 达	1
朗读与呐喊	莫 言	19
那些年,学外语的那些事儿	张 翎	26
建水笔记	于 坚	31
看字	张瑞田	92
诗歌史上最漫长的一场雨	毕飞宇	96
月亮村的记忆	雍 措	103
土陶本纪	宋长征	113
阿伯拉尔与爱洛伊丝	赵荔红	128
长江四鲜漫忆	丁 帆	141
人间事散记	林纾英	146
父亲和我	肖复兴	166
昭通信札	鲁若迪基	208
三过榆林	李修文	226
清风入怀	谷运龙	242
草语	干亚群	252
在虚拟中到达	范晓波	262
才艺这回事	裘山山	275
土离我们还有多远	鲍尔吉·原野	280
废墟之美	叶廷芳	292
在苗圃	孙 郁	296
薄壳虽小 美不让人	沈嘉禄	303
酸橙	傅 菲	307

这一句唐诗,道尽人生此岸的繁华	潘向黎	312
灵渠	蒋原伦	317
杨绛先生回家纪事	吴学昭	330

梦回祁连

雷 达

哦，民乐，留下我青春身影的地方！仰头可见天神般威严的老君山雪峰，低头可见冰冷刺骨的融雪水在灌渠里澎湃。一年四季疾风尖啸，从不停歇，风神呜呜的，似在捉拿并拷打一个脱逃的魔鬼。男人和女人们每天绕过村头的涝坝，踏过枯黄的芨芨草，扛着农具，向光滩深处如野马浮动的雾浪走去。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在这里留下过我二十一岁的容颜。

老君山是祁连山北麓东段的主峰，矗立在民乐县城南面，云雾在山腰拉起了带子，显现出山的雄姿。夏天，老君山若起大雾，山下的庄稼就要遭殃了，不出一刻，大雨滂沱；冬天，雾幛拉严到山根下，天地骤然变色，大雪纷纷扬扬，雪深三尺。人们说，老君变了脸，杀羊祭山神哪。

传说有一年，老君发慈悲，扮成一个放羊老头儿，身穿皮袄，赶一群石羊滚滚而下，他要给洪水河修座桥。一个智者说，你的羊怎么头比牝牛头还大，一语泄露了天机，老君化作青烟飞走了，而羊们顿时立地不动，化成散落在洪水河谷中的万年不移的巨石。这个传说很有趣；而我所在的村子就叫洪水村。

压在记忆深处的东西，好像永远沉埋了，其实蛰伏着，有一天会冲开重重淤积，清晰地显露自身。比如“四清运动”，简称

“社教”，现在基本已无人提及，没人觉得它多有意思，它主要发生在农村和农民中，时间也只是一两年间，似乎是一个小插曲，与后来的“文革”风暴关系不大。当然不是这样。“四清运动”的发起与当时中国政治态势的极左主流密切相关。但“四清运动”又是复杂的。不能说它没有整顿农村基层的混乱，整治自“大跃进”以来，乡村干部的专横霸道的某种积极意义，但它却又迅速转向了以血统论为基础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思想体系上，它与“文革”思维是一致的。它是一次“文革”前的操练，也是后来声势浩大的知青运动的一次彩排。但让我纠结的似乎并不是这些，而是隔着历史烟尘的各种亲切的面影，是那个久远年代里，人性的淳朴与异常，残酷与美丽。

二

1964年秋，开学不久，作为大学四年级学生，在下去搞“四清”前，先有个“三查运动”，即“查阶级、查立场、查斗志”，也称为“交心运动”。每个人都要写认识材料，清理思想，深挖阶级根源。为了让“交心”显得更加真实可信，顺利过关，有人就编造些无关宏旨的“错误”，或乐于把某些流行的错误思想扣到自己头上。也有人尽力丑化自己的剥削阶级父辈，以划清界限。有一位学生干部，以绘声绘色地揭露他的富农父亲的种种丑态而闻名，他有一种农民式的幽默和尖刻，并配上各种细节，给人的感觉特别诚恳。他的示范性演讲很受欢迎，有点像后来的“讲用”。和他同村的同学却说，他父亲不是这样的。

在拐角楼的一间宿舍里，我们这个大组，每天聚在一起进行的就是这样的“交心”。一个一个地过。一天最多过三四个人。家庭出身在那时具有绝顶重要的意义，几乎就是一切。它决定着每个人的位置和价值。根正苗红的少数人成为运动中坚，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重要，一个个表情凝重，不苟言笑。我的履历表“家庭出身”一栏填的是“自由职业”，有点似是而非，不好不坏，一度我被作为“红外围”对待。我们那个大组的负责人是班主

任徐清雅先生。她是教西洋文学的,会好几种外语,是位真正的学者。她就是后来全国著名的一位青年理论家的母亲。她和丈夫胡震旦先生一直把我看作他们的得意门生,使我有点飘飘然,并没有感到有多大压力。

我们组有两个重点关照“对象”。一个叫王立人,其父是杨虎城部下,抗战胜利后做过接收大员,逃到台湾后,曾官拜高雄城防司令,大约在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那年,《参考消息》上冒出过他父亲的名字。这把西北小地方的人吓坏了。他一直是我的好友,和我一样单纯,幼时基本没见过父亲,过着孤儿寡母的清贫生活。另一个叫杨晓春,女,人长得漂亮,属校花一级人物,却是“国军”团长的女儿,虽追求者甚众,但仍被视为问题人物。这两个人的“交心”反复了好几次,一直攻不下来,总认为他们怕痛,挖得不深,不敢“刺刀见红”。

那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下午,我不知哪来了一股子勇气,忽然站出来要求发言。我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我们不能搞唯成分论,搞血统论,我用毛主席给出路方面的话作为武器,自认为发言很有水平。我的思想与“文革”中写《出身论》的遇罗克的思想非常相近。

我刚一说完,徐先生立即宣布休会。她拧着身子出门时的背影有些冷硬。我居然毫无知觉。随后只见一个个骨干被召了出去,气氛顿时变得莫名的闷燥。谁都不和我说话了。不时有人推门伸头看看我在不在。俄顷,宣布重新开会,各就各位,房间里忽然很静,但彼此的呼吸声仿佛噼里啪拉地撞击着,要撞出火星了。终于,第一个骨干发言,他严正指出我犯了严重的立场错误,屁股坐在剥削阶级一边,说轻了是认识模糊,说重了是代替剥削阶级反攻倒算。第二个骨干是对我比较了解的人,发言的分量比较重,他说:“你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鸣冤叫屈,你是谁,你又是什么家庭,我看需要好好重新查一查。你和王立人平时形影不离,王自称王奥,你自称雷勃,鲁静宇自称鲁洛,你们三个合起来自称是奥勃洛摩夫,你们晚上不睡早上不起,早饭也不吃。你还说,你心中的女神是玛蒂尔特,她敢把于连的血头颅

捧在膝盖上回去安葬。你为反动的贵族小姐大唱赞歌。你平常夹一本《罗亭》出出进进，自称你就是‘多余人’。是的，你连‘同路人’都不是，你就是一个革命队伍里的‘多余人’！该淘汰了！”第三个发言者却不是骨干，但脸色更加严重，这位同学不断颤声喊叫着我的名字，并用颤抖的指头几乎点到我的额头说：“我们革命群众好比正在楼下游行，你从楼上突然给我们兜头泼下来了一桶冰水，你呀你，你这是直接对抗群众运动呀，是可忍孰不可忍？”事后得知，这位同学的家庭出身问题更严重。我当时是半低着头，偶然抬眼，见他气得发抖，嘴角溢出白沫，心想：怎么了，至于吗？

这时有人在外面敲门喊，“食堂要锁门了，快下来吃饭吧”。于是会议不得不中止。徐先生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她指出我的发言不是偶然的，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动向的一种表现，思想本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反动的阶级调和论，是用合二而一来反对一分为二等等。那时正在批判杨献珍和周谷城，她把我跟他们挂上了。她的发言无疑具有深度和高度。她变得不认识我了，她看着我，冷若冰霜。多年后有人告诉我，那次徐先生也是不得已啊，她对你其实很好，她的出身问题更大，组织上正在观察她呢。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黄昏正赶上老天爷“下黄土”，现在叫“沙尘暴”。九月里下午七点钟光景，应该还很明亮，但那天是漫天昏黑，不辨人形，呛鼻迷眼，呼吸困难，好像老天也来羞辱我。下楼时连王立人和杨晓春的背影也是冷冷的。在食堂外的小操场上，吃饭者谁都不理我。那天吃的是疙瘩汤、金银卷就炒咸菜。我和着沙尘艰难而无味地吞嚼着。这时班长王忠端着饭盆走了过来，蹲到我面前。他是“老好人”，年龄比我大。先是蹙着眉头不停地唉声叹气了一阵子，然后说：“昨天晚上我们刚刚研究过，要发展你为依靠对象，觉得你虽然不太关心政治，有点走‘白专’，但家庭相对简单，人也比较单纯，有啥说啥。你看你，今天闯了多大的乱子啊，捅了多大的娄子啊，唉唉，你的问题还得上报校部呐，能不能被批准参加‘四清运动’还是个问题

呐。”我一句话也说不出，估计模样极难看，但并没有哭。我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走向宿舍，拉开被子蒙头就睡。

三

当然，并不存在批准与否的问题，不可能把我一个人留在学校。1964年国庆一过，我们就奔赴“四清”前线。地点就是老君山下的民乐县。这次运动历时八个月，于第二年，即1965年5月初返回兰州。说实话，当时的我其实是兴奋莫名的，像一匹撒欢奔跑的马驹子，再也不用坐在闷暗的宿舍里没完没了地开会了。

拂晓时分，火车过了乌鞘岭，白雾渐渐散去，再往前行，过了古浪峡，眼前忽然现出广袤的戈壁滩。久闻大名的河西走廊终于现身于眼前，让我无比激动。那个年月，人的流动概率极低，基本哪儿也没去过。千里河西走廊对我很有诱惑力。从车窗下望，只见天朗气清，红叶欲燃，荒滩上不时出现一座座长方形的古老土堡，越往后走堡子越多，有的堡子四角升起“堞垛”，还有炮眼。但不见人，土堡大部分已倾塌了，不由引人遥想古代。

进入黄羊镇以西地面，土地肥沃，村舍连亘。河西地区收获季节晚，场院上还有人在“碾场”。收割过的田野上有堆堆粪肥，有人煨起了粪饼，蓝烟袅袅升起，若隐若现，状如指路的仙人或婀娜的女神。毛驴颇多，当地社员穿光板老羊皮袄，斜跨驴背，嘚嘚蹿行，从火车上看下去，是迅速移动的小黑点，别有一番古意。

这时我们发现了古长城的遗骸，一段段残垣断壁，在秋风中独卧于沙丘之上，如伏虎，如怪兽，中间还杂有烽火台墩。这带来了大欢喜，我们一个个狂喊着“看啊，看啊”，后来火车的另一侧也发现了古城墙，它几乎一路陪伴着我们。懂行的人说，这叫“断壁长城”，属于明长城，其苍凉的况味难以形容。这就是1964年秋天的河西走廊给我的第一眼印象。

此时我想起了《烽火台抒情》一首诗，是甘肃师大学生诗人

何来写的。196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将此诗与臧克家、贺敬之、郭小川的诗放在一起朗诵过，在甘肃学界轰动一时。其诗有句云：“你鬃子山下奔逐着的长城啊，风尘仆仆万里来，迈过多少战乱的岁月，多少寂寞的年代；你雾霭里明灭的古道，去凉州，通瀚海，几回驿马羽书，多少铁血化尘埃！”这是那个年代惯用的宏大调子，铿锵有力，震荡人心。写的正是河西走廊。

我们在张掖下了火车，住了一晚，第二天换乘解放牌卡车向民乐进发。“四清”工作团有两千人，据说那天正好用了一百辆卡车，其场面之浩大，用遮天蔽日，排山倒海，地动山摇，都不算过分。我们穿戴着兰州军区以极低的价格配给的棉军帽，旧军大衣，军用大头鞋，一个个好不威武。除了没枪，什么都有了。想到几天前还在恭恭敬敬地“检讨”，现在忽然一身戎装，男女同学相视而笑，不觉豪情满怀，忘记自己是老几了。

车队构成了一条长达数里之遥的长蛇阵，中外战争巨片都没见过这样大的阵势。从张掖到民乐，一百多里，主要在戈壁滩上行进，过了东乐镇后折转方向，我们可以不断回首观赏车队曲折逶迤、烟尘滚滚的景象，还有人说他看见了传说中的“海市蜃楼”，激动得不得了。那一天，民乐大地在颤抖，寂寞了亿万斯年的戈壁滩似乎从没这么喧腾过。试想，一百辆卡车，数千之众，突然涌进一个只有七、八万人和只有一条小土街的小县城，怎能不构成“雷公打豆腐”之势。老乡们一个个看傻了，有的半天合不拢嘴，有的啧啧叹道。1949年王震的队伍过民乐，阵势也大，可也没有这么大啊。车辆因为一时疏散不开，我们不得不长久地与路边的群众车上车下默默对视，有些尴尬。这一天的晚上，民乐全县就有五个“四不清”因为极其惊恐而自杀了。我要分配去的那个大队的会计，吊死在老戏台上。

“四清”工作团由三方面人员构成：一方是兰州大学师生，一方是武威地委机关及所属单位干部，一方是武威炮校的军官们。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越来越感到武威地委的干部人才济济，有老革命，有智囊人物，有笔杆子，还有农村工作的“老手”——他刚一张口农民们就笑了，真是藏龙卧虎；而武威炮校的军官，

大都腰挎手枪，个个精神，他们人虽年轻，资格却老，那时距离解放战争胜利才十四年，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四野的、一野的，有过参战经历，但你不问，他绝对不提。我们大队的刘参谋就带我到河滩打过五四式手枪，他紧抓住我的手，怕我乱动，让我向荒崖连开了三枪，看弹壳冒着青烟蹦出枪身，真来劲，我过了个枪瘾。

四

在大队部住了第一夜。清晨，风小了，出门望去，我发现一个穿红袄的小姑娘，颠簸在小毛驴的背上，半弯着腰肢，一起一伏的，甩打着小腿儿，小驴蹚过了一条清浅的小河。这画面让我沉醉、感动，刻印在我脑海里多年。

当地老乡个个头顶着一种毡帽，表情沉默木讷，这帽子呈铲子形，帽舌伸出老长，它有个费解的名字，叫“牛吃水”。看起来怪怪的，恍然有进了罗刹国似的感觉。后来才明白，此帽样子虽难看，但平日挡风，夏天遮阳挡雨，再毒的太阳也晒不透，再大的雨水都会沿两翼流出，一抖即干，冬天拉下帽檐可防耳冻，故而冬暖夏凉。这里的河西女人外出必蒙面，为的是防风防晒防寒，一个个用头巾缠住头，只露出一双骨碌碌转的黑眸子，你无法探知那后面的表情，除非你跟进家门，看她们卸了妆。

然而，让我万分惊愕的是，五十多年后的现在时，我曾碰到过一位在京的民乐籍的大学青年教师，聊天中我问他，“你们那儿老乡都戴牛吃水毡帽吧”，他摇头；我问，“你们那儿女人外出都是蒙面的吧”，他更摇头，他甚至根本不知道“牛吃水”是什么。我的天，这个世界真是变了，地变天也变，从风俗到气候，变得无法辨认了。我不服气，又问“你们那儿把父母叫‘娘老子’，把‘跑掉了’叫‘排掉了’，对吧”，这他点头。当我说“你们那儿把不务正业的流浪汉叫‘五二鬼’”时，他哈哈大笑，连连说“对、对、对！”

且说，我们住进了老乡家以后，才知道这里有多贫穷。我住进的那家人少，一个瞎眼老汉和他的儿子，两条光棍。儿子叫李

希林，人长得挺拔精干，曾在钢厂干过，母亲病逝多年，他对老父亲极孝顺。这个家真是空空如也，推开四面漏风的破门，就是一盘炕，土炕上的被子补丁摞补丁，色泽污暗。为了我的到来，李希林换上了他准备结婚用的一领新炕席。这应该是很大的事。我很久以后才知道。

李希林说，挑选可以住工作队的人家可难了，既要是贫下中农，还得家境过得去。有的人家根本不敢让你们住啊，那些家就在炕上铺一层麦草，睡觉时往草里一钻，清早起来赶忙抖净头上身上的草渣儿。有的人家女人只有一条裤子，她和女儿谁出门谁穿，在家的就窝在炕上，当然，真穷到这个份上的也不多。我听了吸一口凉气，心想：谚语里不是说“金张掖，银武威”吗，怎么穷成了这样？

只有吃了“派饭”，你才能真正体会到老乡们生活的艰辛。这里要对“派饭”这个历史性名词略加解释。那些年头，运动多，临时任务多，上面经常抽调一些干部组成工作组、检查组，到农村指导或检查工作，简称“驻队干部”“蹲点干部”。驻队时间或十天半月或三月半年不等。这期间“驻队干部”轮流在各农户家吃饭，每顿每人付四两粮票和二毛钱。对农家而言，管“派饭”是一种负担，但又是一种荣耀，一种“政治待遇”，地富反坏是无权管“派饭”的。农民们常年吃糠咽菜喝清汤，每逢给干部“管饭”，却互相攀比，要提升一下档次。工作队严令必须与老乡“三同”，伙食水平保持一致，不得超标，但老乡们还是有做白面拉条子的、蒸小馒头的、炒小炒的，甚至个别还有过包饺子的，最不济的也是油泼蒜泥土豆，外加酸菜花卷儿。当地产优质红皮大蒜，每顿饭都会摆上。

每次吃派饭，都是刘组长带着我。刘组长是法院的，我的顶头上司，他高个儿，面容坚定，语速慢，说话严谨，他对我却好，总叫我尢雷子。我们出门调查、座谈、开会，总在一起。我们坐在老乡的炕桌边，老乡把好吃的端给我们，一个劲儿地劝我们多吃，然后老乡自己躲在外面喝青稞面拌汤或野菜汤。我们的心情是矛盾的，吃惯城里饭的我们，也饿，甚至馋，也需要补充营

养,可老乡吃得这么差,让我们吃不下去。老刘总是举着花卷儿或夹起菜来正色道:“以后你们吃啥我们吃啥,千万不能给我们单做。”主人总是谦恭地堆着笑说:“好我的书记嘞,我们十天半月才管一次派饭,哪能让你们喝洋芋拌汤子呢。”老乡把工作队的人都叫书记,或者干事,我都享受过书记的尊称。

孩子却不管这一套。我们不止一次地遇到,脏兮兮的小男孩小女孩,流着双管鼻涕,端着自己的汤碗,死死地盯住桌上的饭,盯得我们发毛,无法放开吃。更有一次,一个小男孩嗖地翻上炕,用小脏手迅如闪电一般抓起饺子就吞,主人进来大怒,一个耳光把孩子扇到炕下打旋,孩子嚎啕大哭,我们一再护住孩子。这顿饭我们哪里还吃得下,只能落荒而逃。在我,真是吃出了一种犯罪感。

这个地方,或因半农半牧,或因边远蛮荒,历来男女关系比较随便、开放,所以工作队有严明纪律,规定与女社员谈话,必须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工作队员在场,谈话时必须敞开房门,晚上一律不得找女社员询问。在开头的一段,执行得很坚决,于是在县团的一份内部简报上,出现了这样一条“情况反映”:“由于工作队进村后作风严肃,有的落后妇女就说,工作队的男人没长球。”我们的主要工作本是扎根串连,依靠“根子”们,揭开阶级斗争盖子。但打开局面很难,家族关系盘根错节,后来还发现,我们倚重的某些“勇敢分子”,其实是依靠错了,这更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倒是在生活作风问题上打开了缺口,发现各队的村干大都存在“嫖风”问题,听说某公社有个队长和会计互换老婆睡,生的娃名字就叫“换换”,成为笑谈。战果迅速扩大,案子越扯越繁,这使工作队员们很兴奋,因为那个年代男女关系也是严重的问题啊。可是武威地委的同志们太了解相邻地区的土风了,工作团团长,地委书记程雪同志马上就发现大方向有所偏移,他要求各工作组立即停止追查男女关系,重点要放到清政治、清经济上来。

那时原则上要求工作队每周与老乡同劳动两个半天。因老刘和其他人都有更重要的事,每次都是我去,渐渐老乡也不拿我

当外人了。洪水河边的原野上，最习见的就是芨芨草，长在地边路边，高尺余，黄灿灿的耀眼。木轮牛拉车也是一景，轮子极大，很像俄罗斯列维坦油画里的大车，打场时装麦草用，或用它往地里运肥，颇具田园风味。

红红绿绿的成群妇女，扬起榔头打胡基，我也夹杂其中。我因不得法，榔头把儿攥不紧，腰太硬，据说姿势很滑稽，手上起了几个大泡。正狼狈间，环子这丫头，猛地从后面向我冲来，冲了我一个大跟头，众皆大笑。环子姓郝，是团支部副书记，爱唱歌，一见面就推搡我，说：“雷干事，今晚上你总该给我们教新歌了吧。”我那时附带负责给青年教歌，半月左右教一次，在土堡里。那年代唱的歌有《勤俭是咱的传家宝》《打靶归来》《社员都是向阳花》《汾河流水哗啦啦》。

环子皮肤微黑，很水灵，一笑就露出雪白的牙齿，两颗又大又亮的眼睛毛茸茸的扑闪着，两颊照例有紫外线强照射后形成的两片红晕，俗称“红二团”，但这反而使她透出一股子野性美。她一会儿咯咯地大笑，一会儿挤眉弄眼，调皮地捉弄人，一会儿又噘着嘴发脾气。她那样子，用现在网络名词就叫“卖萌”。有一晚教歌，我靠着墙睡着了，她掐醒了我，说“为什么不教了”？我说“困啊”。当时我很恼火，为什么对别的工作组你那么恭敬，为什么在我面前这么放肆。

叔本华说：“人是这么一种动物，既要吃面包，也要看马戏。”说的太对了。你看欧美国家看足球的，看篮球的，看网球的，万头攒动，老头老太太儿童也不例外，时间再宝贵，这乐子是不能缺的。人确是需要娱乐的，哪怕再苦再穷再累；只是，贫困会把娱乐的方式扭曲和变形。一天，秋阳高照，风也柔软，我们在干沟里小歇。我躺在避风处盖着外衣眯盹，忽听咚咚咚一阵急促的跑步声，随后就传来了一声高过一声的爆炸般的哧笑。我好奇，走近前一看，原来女社员们，也有男社员，把一个中年男子撂倒，褪下裤子，并把其脑袋不断往裤裆部位下压，说这叫“苏秦背剑”，也叫“弯弓射雕”，再将其仰翻，暴露在阳光和野风中，有人笑出了眼泪，有人喜得直跳脚，有一女子笑得浑身乱颤。

据说被示众的苦主一般是不会恼的，起身拍拍土，一笑了之。有人喊，“雷干事来了，快跑”，一女社员却说，“雷干事来了，怕球哩吗”。我只能面露尴尬的笑，扭头装没听见。后来，我听到过一个顺口溜，专道甘肃某些地方的贫穷落后，说是“开会靠吼，种地靠牛，点灯靠油，娱乐靠球”，这再一次让我发出苦涩的笑。

那时还有一种难言之隐是，浑身長虱子，奇痒难当，开着会不由人不摇头摆尾，歪肩扭臀，样子难看。女队员也有相似表现。有人说后半夜奇冷，能冻死的，我试过，冻不死，衣缝里虱子虻子仍然结成团。还是李希林有办法，他找来几大包六六粉，倒进大铁盆，再将我的衣裳放进去，反复煎煮。这一招果然灵，虱虻们遁形了，我人也清爽了许多。

有一天，我去大队部，看见环子坐在大门槛上，用木盆洗衣服，手冻得通红。她家就在这长着一排白杨树的大道边，道边有条小溪。我边走边嚼着李希林给我的干沙枣，顺手递给了她一把，她接过枣子，扭过头，再转过来，却眼含着泪，我说“你怎么了”，她说“心里难受”，忽然没了平日的嬉笑。午后，我从队部回来，她老远就向我奔来，直撞到我怀里，喘着气说：“你又回来了。”我感觉到了她温热起伏的胸脯和呼出的气息，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忙推开她。她并不是小丫头，快十八岁了，叫别人看见多不好。我急忙向大路两头望去，幸好中午没人，只有白杨树在风中拍着手儿喧哗。

五

进入十二月，天寒地冻，北风怒号，洪水村的斗争形势渐渐推向了高潮。工作组和贫协的“根子”们天天开会到半夜，终于敲定了斗争对象名单。其中有一人漏网，他叫郝得全，会一点兽医，也会一点人医，在最饥饿的那一年，他伙同他人杀了队上的一头驴，煮熟了卖钱，分得25元；他还伙同饲养员，偷过一袋豆料，那本是牲口的口粮；他还帮人从青海贩过牛。他的“罪行”已构成破坏生产资料罪，因为他的成分是贫农，又与地富反不沾